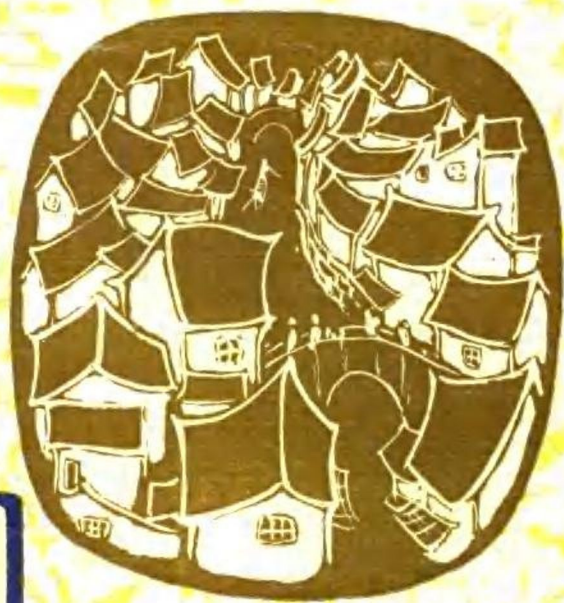


傳統與近代的二重變奏

——晚清蘇州商會個案研究

巴蜀書社

● 馬敏 朱英 著



● 作者 馬敏 朱英

傳統與近代的二重變奏

——晚清蘇州商會個案研究

(川)新登字008号

责任编辑：梅锦辉

封面设计：谢 凌

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

——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 马敏 朱英著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4.75 插页7 字数300千

1993年7月第一版 1993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190册

ISBN7—80523—542—2/K·116

定价：8.70元

序 言

章 开 沅

马敏与朱英都是我“文革”以后的学生与同事，但他们从事的商会研究，却是我“文革”以前即已着手筹划却终于被迫中辍的课题。因此，他们合著的《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得以出版，帮助我了却了一桩多年未了的宿愿。

记得早在1964年春天，为了筹备“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委员会”计议中的有关资产阶级调查项目，我随同杨东莼先生前往天津，有幸看到收藏完整而内容又极为丰富的天津商会档案。同行的北大邵循正教授当时即有感慨，再三向我强调社会集团研究的重要性。邵先生属于沉默寡言类型的诚朴学者，平常少于言谈，但每有建言必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贴切之语。他显然不满于流行一时的贴标签式的所谓“阶级分析”，因此才提出这一发人深省的重要见解。不过，1964年已是“社会主义革命深入”的岁月，阶级斗争之纲越抓越紧，所以随同“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委员会”的夭折，包括商会研究的有关资产阶级调查计划也就成为一纸空文。这年秋天，我因所谓“替叛徒李秀成辩护”得罪，被迫停止教学与研究，从此长期成为重点批判对象，

商会研究早被丢在一边。

事隔近20年，直到1983年8月，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的第一次“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讨论会”上，我才重新提起这件往事，并且郑重强调社会集团研究的迫切需要。曾是“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委员会”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黎澍先生，当时也正好参与此会，并为这段往事感叹不已，因为杨、邵两位均已长辞人世。会后，我把自己在会上的发言整理成《关于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若干意见》一文，经由《历史研究》杂志发表。文中强调指出：“我认为，集团研究可以作为个案研究与类型研究（或个体研究与阶级、阶层研究）之间的中间层次。因为，阶级、阶层决不是个人简单的相加，正如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也不是企业的简单相加一样，而集团则是个体与整体之间的纽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把资本称作‘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实即代表资本主义经济领域的一系列规定和关系的综合。这些规定和关系，在资本家个人或单个企业中固然已经存在并以多种样式表现出来，而在一定集团（如资本集团、企业、商会等）中则往往可以更为丰满也更为明确地得到表现。多样性的充分展示，常使统一性的揭示更为容易，这是许多探索历史客观规律性的学者的共同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也不例外。”“其实，推而广之，无论是人类社会或自然界，无论是社会或自然的哪个领域和哪个侧面，其本身结构和研究方法都是多层次的。以生物学为例，个体的研究必须经过种、属、科、目、纲、门的逐次归纳分类、演绎比较，然后才有可能获致对于动物界和植物界的整体认识。而且，个体内部结构有细胞→分子→量子诸层次，个体外部环境有种群→群落→生态系统诸层次，其间同样也存在着许多规定和关

系，因而也就决定了生物学及其分支学科研究方法的多层次性。人与一般动植物固然不能相提并论，但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及其间的多层次性，则是共同具有的。……因此，在资本家个人和资产阶级整体（或其某一阶层的整体）之间，多做一些集团（如资本集团、行业、商会以至商团、会馆等等）的研究，然后再进行类型的归纳与区分，所得结论可能比简单的上、中、下层划分更切合实际一些。这是由于，构成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许多规定和关系，在集团中间比在个人（或个别企业）身上展示得更为完整和清晰，从而也就更加有利于对阶级、阶层作总体的理论概括。”

华中师大历史研究所与苏州市档案馆亲密合作，对苏州商会档案进行整理、研究，发端于1980年冬而正式开展于1982年，至今已有整整十年之久。马敏、朱英不仅始终参与档案的整理、编辑工作，而且在坚实的资料工作基础上，由多侧面的专题研究，进而从事系统的、综合的乃至理论方面的研究。现今出版的这本专著，可以看作是他们多年辛勤耕耘的丰硕成果荟萃。本书不仅详细地描述了晚清苏州商会产生与发展变化的过程，而且对它的组织系统、社会职能、团体性质及其在社会生活各层面扮演的角色与作用，都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商会是1904年以后出现于中国大地的新事物，不仅活跃于通都大邑，而且分布于许许多多州、县乃至集镇，在20世纪最初10年已经形成全国范围的巨大网络，并且在经济、政治乃至文化生活中产生越来越明显的作用。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历史，如果忽略了商会史的研究，则将成为一个重大的缺失。值得庆幸的是，商会史研究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中外学者的注意。1990年以来，天津、苏州两大商会的晚清档案，已经相继出版问世，上海、苏州两个商会的系统研究又已形

成学术专著，报刊发表的有关商会的论文也日渐增多。据我所知，美国东部和西部若干著名大学，已有青年学者决定以中国商会研究作为他们的博士学位论文。所有这些情况，都使我们多年努力从事商会档案整理与研究的同事们感到欢欣鼓舞。

多年以来，我们对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论述，大多囿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的成说。80年代以后，人们思想渐趋活跃，与海外学术界的交流也越来越多，而有关中国资产阶级种种问题的学术论争也就随之连绵不绝。以往这些争论，对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自然有助于认识的深化。但毋可讳言，许多论争往往停留在理论概念上兜圈子，若干论者甚至对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况并无任何切实的了解。我们认为，既然现在商会档案已经陆续整理发布，资料条件已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优越，有志于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的学者，应该投入相当的精力考察、分析、阐明这些历史的实录，多作一些专门的、深入的具体研究，把一个个重要的人物、企业、机构、社团、群体弄清楚。这样再进行理论层面的研讨与争辩，就可能以更为充分的史实作为依据，而不致流于空泛乃至信口开河。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中国近代社会具有非常明显的过渡性，清末崭露头角的所谓“绅商”群体，也具有非常明显的过渡性，很难把他们截然界定于某一单纯的阶级或阶层概念之中。我们不能简单地按照欧洲早期资产阶级的模式来要求晚清的绅商，因为两者有不同的社会背景与发生、发展历程。我们必须首先把晚清绅商的实际情况弄清楚，然后才有可能与西方早期资产阶级作名符其实的比较研究。至于究竟给“绅商”这个群体冠以什么名字？中国有句老话——“名实相符”，首先应该弄清事实，然后再斟酌确定给以什么适合的名字。命名

是研究的结果，而不是研究的开始，我们过去在这个重要方法论上常常是弄颠倒了。我希望，通过商会研究增添一个新的突破口，把过去习以为常而其实是非科学的所谓“科学方法”纠正过来。

目前是出版难，品位较高的学术著作出版尤难。巴蜀书社慷慨地出版两位青年学者的这本专著，体现了高尚的出版家风貌，借此机会我再一次向他们遥致诚挚的敬意。

壬申初冬于美国圣迭哥市枫庐

前言

1982年初春，刚刚考取华中师大历史系硕士研究生的我们，在刘望龄教授的带领下，于融融春光中来到江南的姑苏古城，同苏州市档案馆的叶万忠、林植霖、屠雪华、姚开顺诸同志合作整理、编辑卷帙浩繁的苏州商会档案。这项巨大而有价值的学术工程是由我们的导师、著名辛亥革命史和中国近代史专家章开沅教授极力发起和主持的，并得到苏州市档案局、档案馆领导的热情支持。

一到苏州，我们顾不得舟车劳顿，也来不及观光慕名已久的古城绮丽风光与园林名胜，即投入了紧张的整理和编辑工作，日以继夜，剔抉爬梳于汗牛充栋的档案文献中。此间极其丰富的历史文献收藏，使我们两个刚刚踏入学术殿堂的年轻学人眼界大开，简直有些乐而忘返了！经过几度寒暑的辛勤劳动，在编辑小组的通力配合下，我们终于编选出了长达120余万字的《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圆满完成了任务。

本书正是基于上述极其丰富和弥足珍贵的档案文献并参以其他报刊、方志、口碑资料撰写而成，旨在为学界和后人提供一个可资认识近代商会组织和城市社会经济生活的“活的社会组织细

胞”。我们的业师章开沅教授向来强调社团或集团研究，认为阶级、阶层决不是个人简单的相加，而集团正好是个体与整体之间的纽带。资本主义经济领域里的一系列规定和关系，在一定集团中则往往可以更为丰满也更为明显地得到表现。作为其弟子，我们亦有同感。时下，复兴和加强社会史研究的呼声在史学界日益高涨，并已先后在天津、南京和成都召开过三次全国性的中国社会史学术讨论会。社会史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社会生活，即历史上人们的群体生活和生活方式。其具体内容包括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不同阶级和阶层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宗族聚落、风俗礼仪、观念规范、社团会党、宗教迷信、节令时尚等。尽管目前学术界对社会史研究内容的看法尚有分歧，但对社团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则均无疑义。特别是近代以降，社会的组织程度大大提高，人们的各种社会活动大都是通过社团的维系进行的。因而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应该将社团置于重要地位。商人在晚清社会生活中已成为一支极为活跃的社会力量，新式商人社团则是商人们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依托，故而从社会史角度研究社团，应首先注重于包括商会在内的新式商人社团。此外，在研究方法上，廓清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内容与方法，从宏观上揭示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生活的运转，固然是必不可少的，但密切结合中国社会历史实际，利用丰富、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深入进行各个社会领域及侧面的个案研究，实乃当务之急。只有在大量个案和实证研究基础上，我们才能对中国社会的全貌获得比较切实的认识。就社会史学科的特征而言，也是以实证研究、个案分析为优长的。当然，这种个案研究应避免孤立地就事论事，罗列史实，而应小中见大，在剖析各类社团时，对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作

出比较切实的考察，努力从理论高度揭示制约各种社团运行轨迹与特点的社会动因，揭示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内在规律。近代商会只是一个重要社会细胞，近代中国社会的整体结构特征和诸要素的结构特点，在其内部都有程度不同的反映。解剖这一细胞的组织构造，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加以分析，无疑会对近代社会结构获致更为深切的了解。质言之，力图将对苏州商会的剖析同对近代社会结构变迁的分析相结合，透过商会而观察社会，展现当时城市社会组织的构造与经济、政治生活的实际运行，正是我们在拙著中所努力追求的目标。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对中国近代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发育程度极为关注，成为许多学者研究、讨论的热点。在我们看来，弄清楚近代商会组织的实际运行情况，尤其是商会与行会组织和其他新式社团之间的关系，可能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从我们对晚清苏州商会的研究可以看到，晚清商会组织已经把自己的影响力渗透到城市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商会为核心，众多民间社团组织纵横交错，从而形成一个官府以外的在野城市权力网络，控制了相当一部分市政建设权、司法审理权、民政管理权、公益事业管理权、社会治安权以及工商、文教、卫生等多方面的管理权，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如果不拘泥于字面意义的话，我们完全可以将此在野城市权力网络称之为“公民社会”（或许称为“民间社会”更恰当）的雏型，其背后的推动者，则正是新兴的近代资产阶级。当然，这仅是我们的一孔之见，不知国内外同行专家学者以为如何？

本书得以写成，我们首先要感谢业师章开沅教授，正是他的倡导，使我们能有机会涉足于商会史研究，书中观点，受他启发

处尤多。刘望龄教授系《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的主编之一，曾参与本书大纲的讨论，为写作本书提供了许多指导性意见。唐文权教授亦曾参加苏州商会档案选编工作，本书也采用了他的一些颇有见地的学术见解。在本书交付出版之际，特向他们及其他许多曾鼓励、帮助过我们的师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第一、二、六、七章以及前言和书末附表由马敏执笔；第三、四、五章由朱英执笔。我们诚恳地期待着来自学术界和社会的批评指正。

著者谨识

一九九二年八月于武昌南湖之滨

目 录

序言.....	章开沅 (1)
前言.....	(1)
第一章 晚清苏州社会与商会的创设.....	(1)
一、开埠前后的苏州.....	(1)
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成长与苏州早期资产阶级	(16)
三、商会的创设.....	(33)
第二章 苏州商会组织系统.....	(57)
一、本体系统——总会、分会、分所.....	(57)
二、从属系统——苏商体育会和市民公社.....	(86)
三、协作系统：商会与其他新式社团.....	(107)
四、商会与传统行会组织特点比较.....	(122)
第三章 苏州商会的一般社会职能.....	(141)
一、“通官商之邮”的职能及其影响.....	(142)
二、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纽带.....	(159)
三、不完全的司法职能——受理商事纠纷.....	(201)
四、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渗透.....	(214)

第四章 苏州商会的性质·····	(230)
一、“官督商办”的性质特点·····	(231)
二、资产阶级的社会团体·····	(259)
三、绅商阶层的属性与商会性质·····	(280)
第五章 苏州商会与清末反帝爱国运动·····	(296)
一、苏州商会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的原因·····	(296)
二、苏州商会与抵制美货运动·····	(305)
三、苏州商会与收回路权运动·····	(318)
四、反对洋商非法开店设栈及逃税的斗争·····	(340)
第六章 苏州商会与捐税抗争·····	(348)
一、形形色色的捐税抗争·····	(349)
二、裁厘认捐风波·····	(360)
三、捐税抗争之透视·····	(378)
第七章 苏州商会与辛亥革命·····	(391)
一、革命前夜的社会动荡·····	(391)
二、国会请愿的风风雨雨·····	(399)
三、辛亥前后的从权应变·····	(410)
附表·····	(447)
后记·····	(456)

第一章 晚清苏州社会 与商会的创设

作为一种新型的近代工商社团组织，苏州商会不仅是全国范围内新经济因素崛起的产物，而且也是它所发育生长的苏州地区社会历史环境沿革变迁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正是苏州地区历史与现实、物质与人文相交融的社会生态赋予了苏州商会独特的个性。因此，要想全面而深入地剖析苏州商会这一社会细胞，首先有必要透视它存活于其中的社会有机体，从宏观上把握苏州社会历史沿革情形，尤其是进入近代以后本地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多维、立体性的演化轨迹。

一、开埠前后的苏州

苏州处于长江三角洲的腹心地带，这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古老的大运河绕城而过，四周水网纵横，丘壑簇拥，大小湖泊星罗棋布，不仅风景秀丽甲东南，而且十分有利于发展多种农作物生产。得天独厚的自然和人文条件，使苏州地区开化、发达甚早，成为我国古代农业文明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

苏州建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据东汉赵晔撰《吴越春秋》记载：“阖闾元年……子胥乃使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周围四十七里。陆门八，以象天八风。水门八，以法地八聪。”^①足见城池已初具规模。然而，苏州真正趋于繁庶，当始于我国封建文明的鼎盛期——唐宋时期。当时，随着我国封建经济重心南移，苏州、湖州一带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自然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民间广为流传的“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生动地反映了宋代苏湖地区农业发达的情况。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也有了相应的发展。正是在这一时期，苏州开始享有“天堂”的美称。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在其游记中写到：“苏州是一个颇为名贵的大城”，人民“恃工商业为生，产丝甚饶”。到明代成化年间，苏州业已发展成为雄冠东南的著名贸易和手工业中心。有关明代商业的繁盛，史书记载：“列巷通衢，华区锦肆，坊市綦列，桥梁栉比。”^②“货物店肆，充溢金阊，贸易饷至辐辏。然依市门者称贷鬻财，多负子母钱，远方贾人挟资以谋厚利。”^③手工业方面，张瀚《松窗梦语》中说：“余尝总揽市利，大都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纴，而三吴为最。即余先世亦以机杼起，而今三吴之以机杼致富者尤多。”

进入清代以后，苏州工商业的兴旺繁盛较前又有所发展，所谓：“五方杂处，人烟稠密，贸易之盛，甲于天下。”^④据苏州画家徐扬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所绘《盛世滋生图》卷，其

①赵晔撰《吴越春秋》卷四，页二五。

②同治《苏州府志》，卷二，引莫旦：《苏州赋》。

③《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六七六。

④顾禄：《清嘉录》卷五。

时苏州有市招的店铺达230多家，共50多个行业。^①另据立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的《新修陕西会馆记》碑文：“苏州为东南一大都会，商贾辐辏，百货骈阗，上自帝京，远连交广，以及海外诸洋，梯航毕至。”^②有人甚至认为其繁华程度已在京师之上，“阊门内外，居山货积，行人流水，列肆招牌，灿若云锦。语其繁华，都门不逮。”^③商业的繁荣通畅又进一步促进了手工业商品生产的发达。以织布业为例，“苏布名称四方，习是业者，阊门外上下塘居多，谓之字号。自漂布、染布及看布、行布，各有其人，一字号常数十家赖以举火。”^④据统计，苏州经营青蓝大布的著名布庄字号，康熙九年（1670年）有21家，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有76家，康熙四十年（1701年）有69家，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有72家，乾隆四年（1739年）有45家。另据统计，苏州经营丝织品的著名绸缎庄，康熙十年（1677年）有19家，雍正十二年（1734年）有61家，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有26家。城厢内外的纸坊，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共有60馀家。齐门一带的木商，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有132家^⑤。

发达的商品经济已开始孕育资本主义的萌芽。最为典型的是丝织业中生产关系的情形。乾隆年间，苏州“东城之民，多习机业，机户名隶官籍。佣工之人，计日受值，各有常主。其无常主者，黎明立桥以待唤。缎工立花桥，纱工立广化寺桥，又有以车

①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上，第23页。

②《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375页。

③孙嘉淦：《南游记》卷一。

④乾隆《长洲县志》卷一。

⑤参见段本洛、张圻福：《苏州手工业史》第一章。